

洪治纲 著

QINGNIAN PIPINGJIA WENCHONG
青年批评家文丛

永远的质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永远的质疑 / 洪治纲著. -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9

(青年批评家文丛)

ISBN 7-02-003311-3

I. 永… II. 洪… III. 当代文学-文学评论-中国-文集

IV. I206.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36914 号

责任校对: 郑南勋

责任印制: 王景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200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375 插页 2

2000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00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定价 16.50 元

出版说明

这套《青年批评家文丛》创意策划,受到冯牧文学奖青年批评家奖设立的启发。新时期以来,文学创作势头强劲,文学批评也有了长足进步。冯牧文学奖青年批评家奖,即是意在对那些站在时代前沿,发表富于创见的评论,体现出深邃思考和敏锐的艺术感染力的青年批评工作者予以奖掖,以鼓励他们保持批判的锐气和良好的文风。作为出版者,我们感到将他们的批评文章精选造册,是件值得来做的事情。

本文丛在编写方式上,打破了国内文学批评文集的传统惯例,它不是简单地汇集作者过去一段时间内的批评文章,而是重建“现场”,也即不仅要收录文章,而且要交代有关文章的背景,包括事件、人物和本人的思想、心态;作者在尊重当时文本的同时,运用引言、附记、注解、插话等等方式,坦率表达自己现在观点和态度上的矛盾、变化,甚至困惑、疑虑。这样,本文丛将可读性、观赏性、信息性、资料性融成一体,为提供一种创新的文体进行试验,希望它的独特新颖能够引起读者的关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批评：自我的发现与确认（自序）

“为了真诚坦白，批评家应该说：‘先生们，关于莎士比亚，关于拉辛，我们所讲的就是我自己’。”法朗士的这句话今天看来多少有点苍老，但这种苍老在我的眼中，像红木质地的家具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发显出鲜亮的光泽。是的，我所批评的，就是我自己。这没什么奇怪。我的一切批评话语，都是为了与批评对象建立一种双向交流的审美关系，并在这种交流过程中发现和确认自我的阐释能力、判断能力和精神内在的审度能力。

批评不同于创作，它有着科学的成分，但它又不可能不受批评家自身的方法、目的、表达过程等因素的制约，不可能不带着某种主观化的成分。绝对的公正、客观、准确，只是对批评的一种遥远的怀想，只是一种无法真正企及的终极理想。我们所有的努力就是朝着这个理想逼近、再逼近。我想，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工作者，我们首先必须努力让自己站到批评对象的同一个精

神维度上,以平视或俯视的眼光去审度作品,而不是在一种情感交流或友情赞助中打量创作。这是确立批评家完整独立的自我的先决条件,是维护批评自身科学性的重要前提。我们的批评之所以时常出现偏失、分裂,失去批评的有效性和尖锐感,甚至失去了批评的个性特质和思想锋芒,关键就在于我们不是没有能力去阐释和判断创作,而是我们没有把自己真正地放到对象应有的精神高度上,使话语交流形成了阻隔、滞涨和失语倾向,不仅让作家觉得隔靴搔痒,连批评家自己也觉得不尽如意。

在确保批评家自我的独立性之后,我们还必须解决批评方法、审美价值和观念取向上的科学性。这是维护批评行为公正性和批评话语有效性的重要途径。在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容易陷入自身固有的、封闭的理论定势中,以一种停滞的眼光去批评创作,就因为我们没有与文学自身的迅速发展保持审美的同步性,没有以开放迎纳的姿态去积极地修正、完善自己的批评方法和调整、充实自己的审美观念。批评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批评家对自身话语体系的不断完善和丰富的过程,是通过对创作的动态跟踪,检视自己话语体系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以确认自己作为批评家在角色上的胜任程度。盲目的权威意识、指导创作的优越感以及重建创作秩序和价值标准的奢望,都是我们必须警惕和克服的思想误区。

批评不要过多地企盼反响。尤其是在当今这个充满无序的现实秩序中,批评的心灵尺度变得越来越模糊,批评的声音语调变得越来越柔媚,批评的话语方式变得越来越洋溢着温情的力量,要想在批评的领域中重建它的巨大反响,只能走向某种偏激的歧途。我想,真正的批评应该以平静的心理、苛求的姿态去观照批评对象,力所能及地在话语表述中发出自己的声音,体现自

己的价值标准和审美思考。

有道是：狮子从来都是独来独往，只有狐狸才会成群结队。
这句话对于批评家来说，或许更具有隐喻的意味。



批评：自我的发现与确认(自序)●1

上辑 内心的风景

目
录

- 永远的启蒙●3
白银时代的怀想●8
疼痛的自省●13
伟哥时代的文学●19
在疼痛处幽默●24
拒奖与猎奖●30
写作即对抗●34
小女子，勿多情●40
个人化的迷误●44
白发丛中的智慧●48
裤裆文学的醉与乏●52
呵气的写作●56
在宽容之外●60
眉毛·胡须与名家●64
感官的游走●68
追索与停滞●72
“话题”的蜕变●77
绝望的诗歌●81

先锋的精神高度●90

——先锋文学聚焦之一

永远的警惕●97

——先锋文学聚焦之二

在历史的选择中选择●104

——先锋文学聚焦之三

先锋文学的苦难原理●112

——先锋文学聚焦之四

下辑 永远的质疑

权威的倾斜

——对新时期以来历届全国短篇

小说奖的回巡与思考●123

回眸：灿烂与忧伤

——对新时期以来历届全国中篇

小说奖的回巡与思考●168

无边的质疑

——关于历届“茅盾文学奖”的二十二个

设问和一个设想●212

旷野中的嚎叫

——对新时期以来小说批评的回巡与思考●256

现实叙事与拒绝理想的无定性

——论晚生代作家群●301

后记●320

上辑 内心的风景



永远的启蒙

没有谁能够胸有成竹地对未来中国文学的发展作出准确的预测，尽管类似巫师和术士身分的人目前还不在少数，但在我看来，那只是为了给沙漠中的旅人制造一些海市蜃楼，给落寞的女孩虚设几个白马王子。回首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它给我的感受是：一次次地突围，又一次次地陷入重围。文学最艰难的、也是最原创的命题——思想和艺术的双重启蒙还没有完成。所以，当我站在世纪之交的门槛上东张西望时，我觉得自己很像卡夫卡笔下的那位木桶骑士，不知道那只空空的木桶会把我驮向何处，也不知道冰山的后面是否会出现我想看到的风景。

启蒙，或者说启蒙主义，实际上是人类精神史上最为基本也是最为重要的使命之一。人类精神生活的文明程度、内在质量，都取决于启蒙的程度。在这个开放性的、动态的使命之中，人们只有不断地通过哲学、文学、艺术以及其他一切精神活动方式，

顽强地拆除种种固有的精神栅栏,以恢复和还原人作为个体的生命在文化语境中、在自然物种中、在历史境域中以及在生命本体中的种种特质,才能够为人类的精神活动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才有可能促动人对自身存在的深层发掘。我们的文学先辈,早在二十世纪之初就提出了启蒙的口号,以文学即人学为宗旨,对文言八股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反叛,对文学的御用性质进行了全面的对抗,对禁锢人们的精神枷锁进行了勇猛的冲击。然而,遗憾的是,随着历史反复无常的变迁和各种政治势力的权力交锋,他们的努力并不彻底。既没能完成反叛的任务,扫除制约文学自由发展的各种外围障碍,也没有找到一种真正具有深厚民间基础的、能够代表本民族核心价值信仰的文学精神。此后数十年的文学发展,由于受制于各种意识形态的拘囿,根本没有人重提启蒙的口号。

淡忘了启蒙意识,淡忘了作家对民族精神合力的追问和召唤,我们的文学主流便不可能引导人们真正地进入民族的精神领地、进入国人灵魂的内核进行尖锐地探究与表达。即使是在被视为文学重新复兴的新时期,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再到文化寻根、现代主义引进、新现实主义冲击波以及当前的个人化写作,我们看到,这种文学主潮也是始终与我们政治生活的主流现实相对应,与社会机制的外在变化相对应,不是与人们的精神主脉相对应,作家们始终缺乏一种稳固的、带着明确价值目标和文化哲学的精神立场。尤其是在多元化的文化背景中,我们在获得自由的同时,也不能不承认自己的价值观念和理想标准已渐趋紊乱和失范。存在即合理,作家已失去了对写作立场的必要警惕。它导致的现象是:文化寻根陷入文化猎奇,现代主义衍变成对西方写作技术的效仿,个人化写作沦为个人隐秘的披露……按理,作为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群,他们的精神成长

史最为畸形,在“文革”时期进入教育启蒙,在批判“文革”和清除精神污染中成长,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中进入大学,而在市场经济下开始闯荡生活、成家立业,这一系列反复错位的价值观念以及由此造成的心理失衡却并没有形成他们创作的主导立场,也很少看到对这种精神苦难史进行深刻的反思和全面的揭示。这些都说明,我们对自身的生存境域缺乏历史性的精神观照,缺乏必要的思想启蒙。

例外也不是没有。譬如早期的一些朦胧诗人、张承志、余华、张炜以及少数晚生代作家等,他们试图通过一些带有极致乃至夸饰的方法,昭示人们进入精神领域进行全面梳理和秩序重构,但他们没有形成文学的主导力量,没有成为作家们的共识目标。所以九十年代中期的人文精神大讨论显得别具一格。如果说它是企盼作家们重新找回作为知识分子必须具备的人文情怀,还不如说它是希望在这种寻找中重新让我们看到思想启蒙的意义。诚如有的作家所言,我们没有人文精神,何须寻找它。但我觉得,我们没有人文精神是因为我们没有完成精神的启蒙,没有通过思想启蒙确立知识分子在新的历史语境中的基本角色和使命。由此,眺望新的世纪,在文学渐渐游离人们精神活动主流方式的现实环境里,我感到启蒙的任务更为迫切,也更为艰难。一方面是网络时代的到来,在全球性的信息共享和生存竞争中,我们很难拥有充足的精力去面对精神启蒙这一原本早该解决而又始终未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另一方面没有通过启蒙确立自身必要的精神立场和文化立场,我们在强大的世界信息化背景中必然会陷入被殖民化的境地,文学当然也不例外。尽管那时的中国文学也会以各种方式存在,作家也会活得很不错,但那种文学肯定不是真正地立足于我们民族精神内核的作品,不是代表着我们的文化个性与世界进行多元对话的精神标尺,

至少不可能像我们的国画与西方的油画那样，鲜明地呈示着各自的审美情趣和精神品格。

写到这里，我由衷地羡慕起俄罗斯的作家来。从普希金、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到白银时代一大批作家共同完成的文学启蒙，为后来的作家提供了坚实而明确的精神支柱，使他们拥有了深厚的精神资源和稳固的叙事立场。尽管他们的民族同我们一样的多难，但他们却可以用大量的经典之作和世界级的文学大师来回报这种苦难。而我们，却还有更漫长的路要走。

附记：“精神启蒙”之所以重要，我以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只有通过广泛的精神启蒙，才能解决知识分子对自身文化角色和历史使命的科学理解，才能全面地建立知识分子自身的话语空间——一种相对独立的精神空间。二是精神启蒙本身是一种动态的过程，只有通过不断的、跨学科的最新精神启蒙，才能使人类的每一项人文科学研究成果获得及时的共享，从而促使人类文明的共同进步。但启蒙又是一项艰巨复杂的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只能循序渐进。启蒙与科学、文明、自由、民主紧密地相连在一起，它旨在通过精神的启迪，来解决人们在思想认识上的种种误区，以减少不必要的自我摸索过程。

然而在中国二十世纪漫长的文学历程中，精神启蒙似乎一直很少被人提及。只有世纪之初的文学启蒙运动显得声势浩大，但它完成的只是文学向人学的复归，而对文学应如何去表现人学，作家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劳作者，应如何去完成自身的精神启蒙任务，却并没有解决。启蒙话题的长期搁置，不仅导致了作家对自身的责任和使命长期缺乏科学的定位，造成文学一直受各种非文学意识左右，而且还导致了人们对文学审美功能的片面性了解，对文学基本问题长期纠缠不清。尽管这些情况随着改革开放的步步深入和人们思想观念的逐渐转变，已有所改

善。但新的问题也随之诞生：譬如我们的先锋文学为何很难真正地进入人类生命的内核，很难找到许多原创性的发现？我觉得这里面仍是精神启蒙的匮乏——国外的人类学研究、精神分析学研究、现代心理学研究以及动物行为学研究等等先进的研究成果，早已成为作家们认识人和人的生活的手段，而我们还是在那些学科的表层游走，充其量只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在我们的一些现代作家中产生的影响较大。

因此，在文学中重提精神启蒙并不是老调重弹，而是显得尤为迫切。它解决的不只是作家的思想观念以及艺术观念，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引导作家们面对广泛的生存领域，更科学、更全面地进入人类生命的审察与判断。

白银时代的怀想

人类对历史的记忆总是以断裂的方式延续着,尽管人们时刻都在企盼“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而实际上,许多辉煌壮观的历史波澜往往都长久地遗落在人们的记忆之外。譬如俄罗斯的“白银时代”。这个由一大批俄罗斯知识精英用理想和生命共同铸成的文化复兴运动,曾在世纪之交的人类思想史上留下过极为深刻而又悲壮的一页。然而半个多世纪以来,它却始终被埋藏在世界知识分子的视野之外,成了人类思想史上的一批“失踪者”。我国也只是到了九十年代后期才陆续出现一些他们的著作,印象中最早见到的是广州出版社推出的《复活的圣火》、《彼得堡》等零星作品,而真正全面展示这一时期文化景观的,还是不久前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化丛书”。这套丛书较为集中地介绍了这些在人类知识分子思想活动史上极具震撼力的代表人物及其代表著作,使我们能够大致地了解到

在那块沉重的大地上，一群文化精英们是怎样前仆后继地为恪守知识分子的尊严、良知、理想，为维护俄罗斯民族文化的传统人格而不惜牺牲一切的奋斗过程。

被别尔嘉耶夫称为“俄罗斯唤起独立的哲学思维的时代，诗的繁荣时代，美的感受敏锐的时代，宗教不安与寻觅的时代”的白银时期，主要是指 1890 至 1917 年这段由沙俄帝国专制政权向苏维埃政权过渡的时期，也是沙皇封建专权极度虚弱而又疯狂挣扎的时期，完全是一片“黑云压城城欲摧”的生存景观。然而，面对这种满目疮痍、民不聊生的生活现实，面对随时都会被流放、监禁和秘密处决的生存状态，阿赫玛托娃、索洛维约娃、古米廖夫、别雷、布尔加科夫、吉比乌斯、曼德尔施塔姆、别尔嘉耶夫以及罗扎诺夫……等等一大批文化精英却勇敢地站了起来，他们高擎着由普希金、赫尔岑、陀斯妥耶夫斯基等人承传下来的人文品格和自由精神，以探索人的命运和意义为起点，全面地审视人类精神生活史，并以自身独特的思想方式和言说方式，义不容辞地开始了对腐朽而堕落的俄罗斯意识形态进行艰辛的反抗，对各种新型的现代意识形态及其艺术命题进行了顽强的追问。

这场文化复兴运动的重要标志，就是以俄罗斯象征主义为滥觞的俄国现代主义诗歌运动的崛起。诗人们以决绝的姿态完成了对笼罩俄国整整一个世纪的浪漫主义诗歌的反叛和超越，并以对艺术自由的空前捍卫和对心灵真实的顽强求索开创了俄国艺术的多元化格局，培植了象征派、阿克梅派、未来派、农民诗歌、无产阶级诗歌等等流派纷呈的诗歌景观，并出现了直到今天仍被视为世界诗坛上最杰出的两位女诗人阿赫玛托娃和茨维塔耶娃。作为一种艺术与人生的追求，他们明白“诗和帝国对立”，但他们还是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诗，目的就是为了能够自觉地在